

# 翻译政治学：俄罗斯文学批评和理论汉译的难题

林精华

【内容提要】俄罗斯文学批评和理论的汉译是影响 192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走向的重要文化事件。由于受限于苏俄主流话语对俄罗斯文学批评和理论的规定、中国自身的情势，使得中国对其翻译充满着翻译的政治学考量，如斯拉夫派、学院派、后苏联的文学批评少有译介，对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和理论的译介则充满着误读，这种情形在周扬翻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学位论文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不否认，英文是世界上使用得最广的语言。但是，中文是世界上使用的人口最多的语言，在使用面和使用人数上仅次于这两种语言的，则是俄文。因而，俄文和汉文之间的翻译问题，尤其是曾经深刻影响中国的俄汉翻译，也应该是世界上的重要翻译话题，如苏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是如何经由翻译在中国得到传播，并且这种经由汉译的俄语文本，被认为就是俄罗斯文化自身的表达，而未必是俄语文本自身，这就可能是汉译的俄国文本影响了 20 世纪的中国进程。

论及俄汉翻译是影响中国进程的要素之一，并非翻译者单方面的宏图大志所为，而是社会潮流使然。19 世纪后期以来中国的最大变化是中国不再是亚洲之中国，而是走向了世界，梁任公所说的世界之中国迅速成为现实，哪怕进入世界的过程艰难曲折，充满着痛苦、挣扎。中国的这种变化，不单单是外在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压力，更有文化上自我改造的内在动力。借助翻译外来文化，无论是早期的传教士汉译一些欧洲宗教文本、当时流行的一些时尚文本，还是稍后经由日文中介翻译的欧洲重要文本，尤其是 1920 年代以来直接翻译欧美的各领域重要文本，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力量。也就是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的中国之变，缺少了翻译的推动是难以想象的，并且正是有了翻译的车轮，才是中国得以阔步前行，以至于不仅现代学科在中国的建立、现代社会结构的形成、现代教育制度之确立等无不是通过翻译完成的，甚至中国人的日常表达用语、不再用古汉语思维，依靠都是翻译和引入的外来语，直到 20 世纪末才对这种以译介文化替代本土传统的潮流进行反思。这种情形，客观上符合法国巴黎第三大学哲学系教师拉达·伊凡科波维奇(Rada Lvekovic)《永恒的翻译》(2002)所说的情形，经由翻译接受其他意义，就如同在爱情、欲望、性欲中接受对方，互相融合和改变。不过，翻译在中国的情形实际上远比这复杂，这种习惯于译介外来文化的浩浩荡荡潮流，还隐藏着深厚的翻译政治学考量，例如何以能改变中国人思维、生活方式、社会制度等任何方面的翻译，却没有在中国锻造出真正契合西方价值观的现代性，没有使能借翻译之中介而自如运用现代语言表达和思考的中国被世界广泛接受，相反，具有世界意识的中国与世界矛盾重重。历经百余年的汉译历程，我们看到，导致这种矛盾，不仅有发达国家自身的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还与中国按自己方式译介国外文本，尤其是包括俄罗斯文学批评在内的俄国文本不无关系。

实际上，俄罗斯文学批评和理论文本之汉译，也如俄罗斯文学之汉译那样，皆充满着矛盾。自《小说月报》1921 年第 12 卷号外作为“俄国文学研究”特刊开启真正译介俄罗斯文学批评文本以来，经由苏俄官方话语所确定的俄罗斯文学批评文本开始在中国迅速盛行起来，并影响了中国人的审美表达、替代了传统的中国古代文论、淹没了注重于文学本体论问题讨论的西方文论和批评。这种情形之产生今天看来是难以想象的：一方面中国不仅有着丰富的诗论和诗话、词论和词话、小说评点，甚至有《文心雕龙》这种系统化和以佛学为基础的理论性经典，另一方面中国是要向先进国家学习、寻求解决中国的进步思想资源，而包括文学批评和理论在内的

欧洲文化显然要比俄国的要具明确得多，——在学科成熟程度上远胜于俄国，对此中国何以会接受充满着苏维埃意识形态诉求和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的俄罗斯文学批评？原因之一便是对俄罗斯文学批评的汉译是一种受到苏俄和中国双重限制的跨文化交际，且是受到远超出文学和文学批评之语境所限制的跨文化活动，更何况在翻译系统理论的创始者霍姆斯(James Holmes)《翻译研究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1972)看来，翻译本来就是高度语境化的行为，翻译学就是社会学的一个部分，即翻译的社会学。如此一来，具有强大辐射力的俄罗斯文学批评之汉译的复杂效应，就类似于俄罗斯文学汉译，成为后苏联时代的中国知识界和国际学术界所关心的论题<sup>1</sup>。

—

我们知道，翻译本是很复杂的言语活动，不仅关乎原文本在母国的地位、诠释之类问题，更涉及在新语境的再解述、用新的语言对原作重新书写并再判断等。对俄罗斯文学批评文本的汉译，一开始就不是学术行为，而是中国知识界为寻求国外思想文化资源，以补缺中国传统审美之不足的社会责任表达，而且经历了对西方审美观念之失望，转而因为苏维埃政权发布对中国好感的宣言(哪怕根本没有兑现)，并且为其国际共运的美丽修辞所折服，中国知识界一批所谓进步知识分子把目光从西方理论，集体性投向了苏俄，包括苏俄文学批评和理论也由此被大规模译介。这种俄罗斯文学批评和理论之汉译超越文论翻译本身的活动，是翻译的社会学行为，并有着很多的政治学考量，如周氏兄弟和田汉、瞿秋白和周扬等都是不同时代著名知识分子，以讨论中国问题的立场论述俄国文学和理论，1940年代到1950年代中国讨论俄国文学理论更是充满着意识形态色彩。因而，经由这些人所译介的俄国文学理论和批评，远比奥地利格拉茨(Graz)大学教授沃尔夫(Michaela Wolf)《翻译的社会维度》(2004)所论的情形复杂，即翻译现象与权力结构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关联，权力可以视为翻译过程中的重要因素，权力作用的对象之一是翻译政策，翻译政策体现了政府或相关机构的意志，使翻译合法化有了正当的程序，从而将作为文化活动的翻译置于经济、意识形态和政治等因素的制约之下。而俄罗斯文学批评和理论的汉译历史与现实表明，这种汉译是由1920年代末以来的社会语境所决定，——国民政府和中国大陆政府先后推动的变革，分别热衷于反封建社会价值观、改革甚至要取消制造经济分化的私有制等，而苏俄认定的俄罗斯文学批评和理论包括积极叙述如何传统庄园制度和资本主义变革之弊，由此得到了左翼党团的财政支持、社会观念的理解、进步知识界的认可等；这样的情势，决定着俄罗斯文学批评和理论之汉译不可避免地和中国社会制度变化关联，诸如选择哪些俄罗斯文学批评和理论文本汉译，译介者不是依据论述文学的深刻性和论述的文字水平所决定的，而俄罗斯文学批评和理论的汉译文本之生产和流通也是由社会潮流所推动的。

这种译介情势决定了俄罗斯文学批评和理论文本的汉译，首先不是从文学批评和理论的质量方面考虑选材，即从文学内部结构深刻讨论文学特征、个性化探索俄罗斯文学发展规律的篇什，反而因其苏俄社会对之屏蔽，中国左翼知识界也就相应的回避，而那些从文学的社会责任和意识形态功能角度功利主义地讨论文学问题的文字，则得到了积极译介。如此情形，使整个俄罗斯文学批评和理论的译介者之主体性意识，淹没于中国译介俄罗斯文化的整个潮流中，原本注重自觉理论要求的俄罗斯文学批评，在汉译过程中也变成了夸大原文本的政治诉求、社会功能、意识形态表达等。诸如此类情况形成俄罗斯文学批评和理论的翻译形成了以下格局：

中国对俄罗斯文学批评和理论的译介，很长时间难以突破这样的僵局，即苏联把俄国重视文学理论的传统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高度，自然限制了文学批评和理论作为人文学科自由发展的要求。这就是中国只是在主流意识形态框架内译介俄罗斯文学批评和理论。实际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被正式运行20年之久后，导致苏联主流文学发展和文学理论危机日益加剧，伴

---

<sup>1</sup> See Mark Gmsa, *Russian Literature of Chinese Translation: three studies*. Boston & Leiden: Brill, 2008.

随自 1950 年代中后期对它的争论以来，理论家们开始试图解决文艺学危机问题并尝试重建之，布洛夫的《艺术中的审美实质》(1956)之审美研究、利哈乔夫(1906-1999)之《古罗斯文学中的人》(1963)的风格研究、什克洛夫斯基的《艺术散文·思考和谈话》(1959)和洛特曼的《结构诗学讲义》(1964)之结构诗学研究、弗里德连杰尔的《俄罗斯现实主义诗学》(1971)之文艺学方法论研究、赫拉普琴科的《历史诗学及其对象》(1974)之历史诗学研究等等都是改造苏联主流文艺学创造性成果。其中，1967 年著名学者尤里·洛特曼就针对科日落夫(В. Кожин)的《结构诗学是否可能?》(《文学问题》1965 年第 6 期)发表了轰动一时的长文《文艺学应该成为一门科学》(1967)，正面阐释形式主义-结构主义价值，提出文学研究中的科学方法论问题，认为“辩证法是结构主义方法论基础”，在文艺学研究的传统结构中事实上存在着两种不同方法——文学研究既可以从社会思想入手，也可从审视其旋律、节奏、结构、风格入手，而结构主义研究则选择后者以解决现代文艺学的矛盾——文学中的艺术想象、表达社会意识的独特形式与揭示作为诸种意义因素之统一体的作品理念，以确定艺术文本系统中各因素的意义<sup>2</sup>。但是，中国知识界却没有从苏俄文学批评和理论的论争中受益，仍然是延续 1920 年代以来的译介传统。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长期以来中国进步知识界追随苏俄的步伐，使俄国现实主义批评和理论、苏俄左翼和官方文学理论体系(科学院和莫斯科大学的著名学者主编的种种《文学理论》)，在中国得到了超乎寻常的重视。这就是，苏联时代选编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普罗汉列夫等人文集，悉数得到翻译。实际上，这些批评家的文本，远非现实主义批评所能涵盖的，例如他们普遍有着俄罗斯知识分子对俄罗斯帝国的强烈认同感、用西方启蒙主义思想解释俄国变革中所出现的各种社会现实问题。而这种译介，一方面导致对俄罗斯文学的认知越来越接受苏联共产主义的定位，把东正教信仰和斯拉夫传统所孜孜以求的道德纯洁的价值观、审美上的社会责任化等都视之为共产主义；另一方面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科伦泰等经典作家在诗歌和小说中使用许多有关性的词语，这样的用语可能更有助于书写俄国社会现实问题，但是俄国文学批评家都回避这类现象，——哪怕性观念解放是 18 世纪以来俄国西化的趋势之一。而中国在急需思想解放的洪流中，却因为主要是译介这些现实主义批评家的启蒙性文本，在这样的审美思想指导下，中国知识界就很难译介叙述人性解放的俄罗斯文本。不否认，这种借口伦理的原因，有意识回避性解放问题的文本，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先后出现过类似现象，如 1886 年 John Payne 英译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谈》，虽是完整译本，却把对英国读者而言有着淫荡所指的原文翻译成中世纪法语，在再版本(1893)中又还原其意大利文；同样，1903 年 J.M.Rigg 英译《十日谈》时，也把那些淫秽的文字保留在意大利文状态(1921、1930 年再版时仍如此)。而这样的翻译并非译者语言能力欠缺，或者翻译态度不严肃，而是英国人的道德规范之约束的结果，E.Stuart Bates《现代翻译》(1936)甚至赞赏这种偏离原文的翻译行为。此外，别林斯基这类民间文学批评家因为自身的学识不足、外语能力不够，多用西方启蒙主义思想讨论俄罗斯文学现象，因而充满着历史的局限性，如别林斯基论述普希金作为当时的重要诗人很有预见性，但普希金这位很有学识的作家 1836 年 4 月 23 日曾致信出版家描述别林斯基形象说，“假如他能够在保持独立见解和敏锐力的同时，多学习、多读书、更尊重传统、更谨慎，简而言之，假如他更成熟一些，我们或许就把他看成一位真正佼佼不群的批评家”<sup>3</sup>。当然，不能否定别林斯基对文学细节的敏感性、运用西方理论诠释俄罗斯文学及其所叙述问题的才能。

在译介俄罗斯文本过程中，特别凸显俄罗斯文学批评和理论的现实主义功能之同时，中国知识界又对文学批评中的东方基督教意识有意识屏蔽之。其中，许多杰出的俄罗斯文学家分别

---

<sup>2</sup> Ю.М.Лотман,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 в должно быть наукой.*//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7. №1; или *О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СПб; Искусство-СПб,1997, С759-762

<sup>3</sup> Пушкин о литературе. СПб.:Мнение М.Лобанова, 1936, С.86

发表了深刻认识俄国身份、社会变革方向、知识分子使命、文学走向等问题的文化批评论著，如梅列日科夫斯基用现代性视野透视俄国文学和文化的《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1901-1902)和《果戈理与魔鬼》(1906)等理论力作、《基督与反基督者》等文学巨作，别尔嘉耶夫等七位著名知识分子的《路标文集》(1909)和他本人讨论俄罗斯民族性的《俄罗斯命运》(1915)，安德列·别雷的《关于知识分子的真理》(1909)、《革命与文化》(1917)、《文化危机》(1920)和《文化之路》(1921)等理论篇章和其《彼得报》、《莫斯科》、《入了基督教的中国人》等文学巨作一样，普列汉诺夫之《托尔斯泰与自然》，勃洛克之《俄罗斯的太阳》(1908)和《果戈理的孩子》(1909)等经典的俄罗斯批评文本，因为有着明显的东方基督教意识和现代主义痕迹，经常被提及，却从未有人译介。

与之类似，对安年科夫、霍米亚科夫、阿克萨科夫等著名斯拉夫派知识分子，以及恩格尔哈特、维谢洛夫斯基等 19-20 世纪之交学院派知识分子的文学批评和理论，因为不是启蒙主义式的讨论俄罗斯问题，就没有得到中国知识界的译介。这些人先后著述了影响俄国文学批评走向的文学史和文学理论之作，诸如历史文化学派代表人物吉洪拉沃夫(1832—1893)的《俄国文学史和古代文化编年史》(1895)和佩平(1833-1904)的《俄国文学史》(1898-1899)、心理学派代表奥夫相尼科-库尼科夫斯基(1853-1920)的 5 卷本《19 世纪俄国文学史》(1910-1911)和《俄国知识分子历史》、波捷勃尼亚(1835-1911)的《思想与语言》等，以及尼古拉·恩格尔哈特的两卷本《19 世纪俄国文学史》(1913)、E.丹尼奇科夫等人合作的 4 卷本《俄国文学史》(1908)、A.斯卡彼且夫斯基那在 19-20 世纪之交连续再版 7 次的《当代俄国文学史，1848-1908》等，这些关注俄国民族文化特性和理想性特点的著述，深刻显示出俄国知识界所达到的思想水平和学术深度，原本是特别需要关注的，茅盾等人在 1920 年代也发现了部分著作<sup>4</sup>，但迄今为止少有人认真对待这类文献。不仅如此，俄国比较文学之父维谢洛夫斯基那很有学术指导意义和方法论价值的之作《历史诗学》，打破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诗学标准的传统，不再仅仅是依据西方古典文学范本推导出文学创作规则和文学评价模式，不用既定的诗学去规范读者的审美趣味，而是回到历史语境中查考不同文学母题或文体的起源和演变，在广泛比较分析各民族文学的具体发展现象过程中，切实揭示文学艺术发展的规律，从文学的历史发展中阐明其本质，并在这个基础上展开对情节诗学、诗歌语言、比较文学等一系列具体学术问题研究，在文艺学与文化史之间建立起来了联系，使文学研究获得了扎实的历史文化基础和意义，但如此重要研究只是到 2003 年才由刘宁教授翻译过来(百花文艺出版社)。

同样，热热闹闹的俄罗斯文学批评和理论之汉译潮流，却不去译介那些重视文学技术性问题的批评、理论文献，哪怕这些文献是有意识用纯粹诗学理论去抵抗负荷了过重意识形态的正统文学观念。这种文献之于俄罗斯文学批评和理论发展史是极其珍贵的，包括波捷勃尼亚的《思想和语言》(1862)和《关于语言艺术理论笔记和讲座》(1892)、维谢洛夫斯基的《诗歌语言和散文语言》(1898)、温诺格拉多夫的《论诗歌语言的理论体系》(1927)、维诺库尔 Г.О.的《关于文学作品的语言研究》(1945)、什克洛夫斯基的《作为情节的艺术》、日尔蒙斯基的《论形式方法问题》(1923)和梯尼亚诺夫的《论文学的进化》(1927)等，对深入认识俄罗斯知识分子是如何深入认识文学内部规律问题，是弥足珍贵的，因而也构成了后苏联学界所重建的文学批评和理论经典系列《俄罗斯语言艺术：从语言艺术理论到文本结构(文选)》(1997)。然而，因为它们不是讨论文学的社会学问题，至今也译介得有限。

也正是在这种译介的结构中，巴赫金及其《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1929)的苏俄再发现(1963 年出版修订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卢那察尔斯基、维诺格纳多夫等著名人士当时发表有书评，1979 年已是著名学者的米哈伊尔·盖斯帕诺夫发表《20 世纪俄国文化中的

<sup>4</sup>参见郎损(茅盾):《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小说月报》第 13 卷第 1 号,1922 年 1 月)。

巴赫金》，论述这位理论家对苏俄思想解放的意义，讨论他对解决俄国或者虚无主义的否定主流意识形态，或者盲目服膺于主流意识形态之困境问题的作用<sup>5</sup>），发现巴赫金的意义不仅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专家，而是“要比形式主义长半辈，后者是未来主义时期的理论家，而他是象征主义时期思想家。他提出的问题与俄国哲学的‘世界神学’传统息息相关，中心问题是人文主义”<sup>6</sup>。因而，随着《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等大批著作逐渐被认可，这就促使人们进一步意识到苏联文艺学危机的严重性和需要改造的紧迫性。但是，中国直到1988年才有译本（钱钟书先生最先发现、钱中文先生最先介绍、白春仁和顾亚铃先生翻译），此后岁翻译和编辑了《巴赫金全集》，却因为没有从结构上理解俄罗斯文学批评和理论，因而全集也没能提升中国知识界认识巴赫金和俄罗斯文学批评的高度。

如此一来，这样的译介格局，没有因为后苏联到来得到真正的改善，也就理所应当了。后苏联俄国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探讨上卓有成效，出现了列夫·安宁斯基(Лев Аннинский, 1934-)及其《我的世纪，我的野兽：俄罗斯、苏联和世界的诗歌证明》(2004)、《恋爱约会中的俄罗斯人》(2004)、《红色世纪。银色和黑色。铜管子》(2004)、《我们需要怎样的俄国》(2007)等，邦达连科(Владимир Бондаренко, 1942-)及其《知识分子的崩溃》(1995)、《现实的文学：20位俄国优秀作家》(1996)、《俄国——语言国度》(1996)、《文学日》(1997)、《狂热的反动分子：俄罗斯爱国主义的三幅面孔》(2003)、《平民的白银时代》(2004)、《帝国的最后一批诗人：文学命运概论》(2005)、《很难成为俄罗斯人》(2007)、《俄罗斯帝国的歌手》(2007)和《孤独的一代》(2008)等，娜达丽雅·伊凡诺娃(Наталья Иванова, 1945-)及其《对后现代主义之克服》(1998)、《苏维埃文化总结》(2001)、《俄国为何选择普京：不只是文学情势的当代语境中的亚历山德拉·玛丽尼娜》(2002)、《新宣传：左边设置和右边风景》(2003)、《文学的保留地：投入一卢布就产出两卢布》(2005)、《这种批评谁还需要？》(2005)、《极端小说，或俄罗斯语言艺术的幻想可能性》(2006)、《逃脱当代。20-21世纪俄罗斯文学：从不完整到后苏联，而现在是全世界的》(2007)、《作家与政治》(2008)、《艰难的十年》(2010)等，爱泼斯坦(М.Эпштейн, 1950-)及其《未来之后：论文学的新意识》(1991)、《俄国后现代主义的起源和意义》(1996)、《回应：“后—”和“超越”、俄国批评理论和后现代主义》(1995)、《俄国文学和文化中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1996)、《20世纪文化中的“超”：从现代主义转向后现代主义的辩证法》(1996)、《后现代主义的初始-或终结》(1996)、《后现代主义与共产主义》(1996)、《世纪之初，或者从后-到初-。新世纪宣言》(2001)等，杜波连科(Евгений Добренко, 1962-)及其《权力隐喻》(1993)、《苏联读者的形成：苏联文学之形成的社会与美学前提》(1997)、《苏联作家的形成：苏联文学的社会和美学起源》(1999)、《社会现实主义的政治经济学》(2007)、《烹饪共产主义：美味与健康》(2009)等，这些批评家及其文献不仅有效解释了后苏联文学发展问题，而且也显示出后苏联批评家在认识文学上的深度。但是，它们几乎完全没有被汉译，导致对后苏联文学认知难以深入。

可以说，汉译俄罗斯文学批评和理论因为受限于中国对苏俄主流话语、中国强调文学的社会使命感，从而使俄国大多数重要的文本无法及时被译介。这种翻译的矛盾性契合瓦尔特·本雅明《译者的任务》(1923)所声称的那样，“一部作品是否可译的问题有双重意义。或是能否在作品的总体阅读中找到胜任的译者？或更确切地说，其本质是否适合翻译，仅就这种形式的意义而言而要求翻译？原则上，第一个问题只能是偶然地断定，第二个问题则是逻辑上确证。只有肤浅的思考才会否认后一个问题的独立意义，并声称二者具有相同的意义”，不同语言间有或

<sup>5</sup> Ред. Ю. Лотмана, *Вторичные межделирующие системы*. Тарту: Тарту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1979, С.113

<sup>6</sup> Седакова, М. *Бахтин-еще с одной* // *Новый Круш*(1)1992, С.117

多或少的亲缘性，而是先验地、除了历史关系之外，在它们所表达的东西上相互关联的，“译文所表明之语言之亲缘性，要比两部文学作品的表面和难以定义的雷同所表明之要深刻和清楚得多。要掌握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关系需要进行一种研究，这种研究的意图类似于认识批判皆以证明模仿理论之不可能性的那种论点”，翻译包含着讨论，讨论或许会成为某种反讽，“可译性本质上属于某些作品——不是说其译文对它们而言必不可少，而是说，存在于原文中的某种意义在其可译性中的自行表现”<sup>7</sup>。但是，俄罗斯文学批评文本之汉译的困局终究并非没有中国知识界自身的价值标准，而是因为中国文人传统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情势所迫，译介者难以保持学者的中立态度，他们无法隐身于翻译过程中，只是更多地看到俄罗斯文学批评强调文学社会责任的这一个方面，不顾及其他诉求，虽然取得了某种时效，却影响了整体接受俄罗斯文学批评的质量，并进一步限定了中国人对文学在俄国发展之实际状况的认知。这种情形，并非具体译者的疏失所为，而是193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是经由苏俄官方意识形态去定位俄罗斯文学批评的语境、潮流所确定的，而非自己对俄罗斯文学批评的发现、体悟；进而，对这种实际上偏离了俄罗斯文学批评本体的翻译，知识界长时间津津乐道于这种翻译的实际成效，而不顾翻译本身的问题，甚至习惯于这样的误译，也就理所应当了。

## 二

对俄罗斯文学批评的译介，因为翻译的政治学原因，不仅造成这种结构上的失衡，而且具体影响到翻译的具体过程，导致最具特色的变形不单在选材和诠释上的偏差，而且在对他们论著的中国式翻译上。实际上，对俄罗斯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翻译，与文学作品的翻译一样，“真”都是翻译必须的，不“真”则意味着对原本的理论 and 批评之翻译得有误，而“真”未必就是最好地传达了俄罗斯文学批评和理论，“真”仅仅是翻译俄罗斯文学批评和理论最基本的标准；“美”是翻译俄罗斯文学批评和理论的重要条件，因为经典的俄罗斯文学批评和理论文本，哪怕不是出自文学名家，也是很有文学修养的知识分子用散文的笔触书写出的，不“美”的俄罗斯文学批评和理论的译文，肯定不是最好的翻译，“美”的俄罗斯文学批评和理论译文则是更好的翻译，换句话说，没有把俄罗斯文学批评和理论的文本翻译得美，也算不得忠实，也是一种失真。

众所周知，俄罗斯文学批评和理论之汉译，最有名的当属周扬译车尔尼雪夫斯基《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大连读书出版社1948年2月初版），而且这个译本中“美是生活”术语作为最重要的唯物主义美学概念，在中国得到了最为广泛的引用、实践。而这个术语是和这段话联系在一起，即“在人所宝贵的一切东西中，他所最宝贵的是生活；第一宝贵是他所愿意过，如他所爱的那样一种生活；其次是一切的生活，因为生活到底比不活好；但凡活的东西在本性上就恐惧死亡，恐惧不存在，而爱生活。‘美是生活’‘任何东西，我们在那里看得见照我们的概念应当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任何东西，凡是独自表现生活或使人忆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sup>8</sup>。问题是这段被广泛援引的话，就现代汉语句法和修辞而言多有似是而非：这究竟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原文表述的含混，还是周扬翻译使然？若是原作的问题，何以在俄国和中国有如此巨大影响力？若是周扬翻译问题，大半个世纪以来，这样的译文何以如此深入人心？

这段译文在原作中也是很著名的：“Самое общее из того, что мило человеку, и самое милое ему на свете--жизнь; ближайшим образом такая жизнь, какую хотелось бы ему вести, какую любит он; потом и всякая жизнь, потому что все-таки лучше жить, чем не жить: все живое уже по самой природе своей ужасается гибели, небытия и любит жизнь. И кажется, что определение: «прекрасное есть жизнь» прекрасно то существо, в котором видим мы жизнь

<sup>7</sup> 陈永国主编：《翻译与后现代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6页。

<sup>8</sup> 车尔尼舍夫斯基著、周扬译：《生活与美学》，大连光华书店，1948年，第7页。

такую, какова должна быть она по нашим понятиям; прекрасен тот предмет, который выказывает в себе жизнь или напоминает нам о жизни”<sup>9</sup>。周扬的译文不是来自这段俄文。据周扬的译后记,该译本是根据柯甘(S.D.Kogan)的英译本(英文版《国际文学》1935年第6-10号)所译的,包括把书名改为《生活与美学》、正文加上一些小标题,并标注这个译者乃苏联著名翻译家。然而,参考苏联的英译本发现这段话是这样表述的,“the most general thing that is dear to a man, than which there is nothing dearer in the world, is *life*; first, the life a man would like to lead, the life he loves, and then, any life; for, after all, it is better to be alive than dead: by their very nature, all living things have a horror of death, of nonexistence; they love life. And it seems to us that the definition: 'Beauty is life'; 'beautiful is that being in which we see life as it should be according to our conceptions; beautiful is the object which expresses life, or reminds us of life'”;紧接着这段英文本的译文是分析生活方式的不同如何带来生命力的差别,从而造成不同的审美观,“Let us trace the chief manifestations of beauty in different spheres of reality in order to test it. Among the common people, the 'good life', 'life as it should be', means having enough to eat, living in a good house, having enough sleep;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 peasant's conception of life always contains the concept-work: it is impossible to live without work; indeed, life would be dull without it”<sup>10</sup>。无论是俄文прекрасное есть жизнь,还是英文Beauty is life,似乎都不仅仅是“美是生活”。

的确如此,作为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深受费尔巴哈的人类学理论影响——在本质上他和费尔巴哈一样,也是强调人的生命的重要性的<sup>11</sup>。这种意识,在这篇学位论文中也能显示出来,如另一著名段落(«хорошая жизнь», «жизнь, как она должна быть», у простого народа состоит в том, чтобы сытно есть, жить в хорошей избе, спать вдоволь; но) вместе с этим у поселянина в понятии «жизнь» всегда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понятие в работе: жить без работы нельзя; да и скучно было бы. Следствием жизни в довольстве при большой работе, не доходящей, однако, до изнурения сил, у молодого псеянина или сельской девушки будет чрезвычайно свежий цвет лица и румянец во всю щеку-- первое условие красоты по простонародным понятиям. Работая много, поэтому будучи крепка сложением, сельская девушка при сытной пище будет довольно плотна, это также необходимое условие красавицы сельской; светская «полувоздушная» касавица кажется поселяницу решительно «невзрачною»……(强调身份、地位、工作、生活方式等差别,带来人的生命力各有区别,导致美的情形各不相同),无不是强调生命活力的重要性——不是说生活的美好。

查著名的С.奥热科夫主编的《俄语详解词典》“жизнь”词条包括六个义项:1,Совокупность явлений, происходящих в организмах, особая форма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материи(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жизни на земле. Жизнь вселенной).2,Физиологическо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человека, животного всего живого(Дать ж. кому. Вопрос жизни и смерти).3, время такого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от его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я до конца, а также в какой-н. его период(долгая ж.). 4,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общества и человека в тех или иных её проявлениях(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ж., семейная ж.).5,Реальная

<sup>9</sup> Ченьшевский Н.Г., Избранные статьи.(Сот. и вступит. статья А. Ланшикова), М.: «Сов. Россия», 1978, С.31.

<sup>10</sup> N.G. Chernyshevsky, Selected Philosophical Essays.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1953,p286-288.该译本根据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辑、国家政治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车尔尼雪夫斯基《哲学选集》译出的。

<sup>11</sup>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这篇学位论文三版序言中明确陈述该文“是第一个应用费尔巴哈的思想来解决美学基本问题的尝试”。据朱光潜先生所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中的人类学原理》(Антропологический принцип в философии)接受了费尔巴哈的人类学原理,而费尔巴哈的人类学原理主要是从生理学来看待人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社会性的人也还是当作动物性的人看待的(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562-563页)。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войти в ж.).б, Оживление, проявление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энергии(улицы полны ж.)<sup>12</sup>, 即这六个义项分别着眼于“存在”、“人的生命”、“生平”或“生涯”、“生活”、“现实”、“生命力”或“生机”等。

而词典上的这些知识,是具有词源学根据的。据俄国著名的古罗斯文化史专家科列索夫(В.Колесов)对“жизнь”词源义的研究,“凡与活的生物或有机体,首先是与人的任何存在联系在一起的一切,在斯拉夫语中一律用词根жи来标识。这个古老的词根源于印欧语时代(gi), жи乃其斯拉夫语的形式:在我们时代初期,根据斯拉夫语硬化规则,更为古老的г替代жи。Жизнь的表现是各种各样、无可计数的,在自己的意识中,人首先把他们固定在一些范围明确的支点上,当然,这些支点是由其思想水平确定的。把一个古老后缀附在词根上,逐渐形成了一些新的独立词,这些词在集体意识中使一些不断变化基本特点得到了稳固,形成了生生不息过程的最初看法”,并举例жила вена для обозначения силы жизни: по вене течет кровьдарительница жизни, без крови нет жизнь<sup>13</sup>。这也就意味着,生命作为жизнь的基本义项,是历史所形成的。

1970年代受业于洛特曼、1980年代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成长起来的帕佩尔诺(Irina Paperno)教授之力作《车尔尼雪夫斯基与现实主义时代:关于行为的符号学研究》(Chernyshevsky and the Age of Realism: A Study in the Semiotics of Behavior, 1988)的最终结论,即“车尔尼雪夫斯基把艺术视为建构现实的完整手段,看作解决人之存在的主要问题的生命教科书(учебник жизни, позволяющий разрешить глав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他不仅研究了详细叙述这种理念的艺术理论,而且创造了能有助于现代人借此掌控现实及改造现实的艺术作品”<sup>14</sup>。

由此,这段话应该译成“对任何人而言,在他活着的时候,没有什么比生命给为宝贵了。首先,人人都愿意按着他所希望和所喜欢的那种方式生活;其次,任何类型的生存机会都同样宝贵,因为无论如何活着终究比不活着要好;但凡生物,就其本性而言,总是恐惧死亡、害怕生命不复存在并且热爱生命的。这样一来,似乎就可以下定义了:‘美是生命’;‘美是一种存在,我们从中能看得见生命,并且是按照我们的理念应当如此的那种生命;美是这样一种事物,它自身就显现或提示生命’”。由此便可以说,上文所引的周扬的译文是有误的,他后来便有所修正,但他仍然译成“有人觉得可爱的一切东西中最有一般性的,他觉得世界上最可爱的就是生活;首先是他所愿意过、他所喜欢的那种生活;其次,是任何一种生活,因为活着到底比不活好;但凡活的东西在本性上就恐惧死亡,恐惧不存在,而爱生活。所以,这样一个定义:‘美是生活’;任何事物,凡是我们在里面看得见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任何东西,凡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sup>15</sup>。

周扬这种问题多多的翻译,远没有达到朱光潜先生《谈翻译》所说的状态——“依我看,直译和意译的分别根本不应存在。忠实的翻译必定能尽量表达原文的意思。思想感情与语言是一致的,相随而变的,一个意思只有一个精确的说法,换一个说法,意味就完全不同。所以想尽量表达原文的意思,必须尽量保存原文的语句组织。因此,直译不能不是意译,而意译也不能不是直译。不过同时我们也要顾到中西文的习惯不同,在尽量保存原文的意蕴与风格之中,译文仍应是读得顺口的中文。以相当的中国语文习惯代替西文语句习惯,而能尽量表达原文的意蕴,这也并无害于‘直’。总之,好的翻译是文从字顺的直译”,与周扬本人理解俄国文学理

<sup>12</sup> С.Н.Ожегов, Н.Ю.Шведова,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4-е изд.). М.:Азбуковник,1999, С.194.

<sup>13</sup> В.Колесов, Древняя Русь: Наследие в слове. Мир человека(古罗斯:文字中的遗产、人的世界). СПб.: Филолог. Фак. СПбГУ, 2000, С.75.

<sup>14</sup>Ирина Паперно, Семиотика поведения: Николай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человек эпохи реализма.М. НЛО, 1998,С.184.

<sup>15</sup> 《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卷),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第6页。

论的观点是息息相关的,按他《唯物主义的美学——介绍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解放日报》1942年4月16日),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社会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活动家,进而称其学位论文和“其他哲学著作一样,表现了革命的和唯物主义的倾向。他把唯物主义的结论应用到艺术的特殊领域。这是一本具有尖锐的、战斗的、论辩的特色的著作,它是对唯心主义美学的一个大胆挑战,是建立唯物主义美学的第一个光辉的贡献”,“‘美是生活’这就是他在美学上的有名公式”,并引述了后来与上述译文完全一致的段落作为原作者本人的思想,如此之论分别作为1948年初版本、1957年再版本的译后记(易名为《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他的美学》)再次刊出,所以周扬会把“что прекрасное в природе имеет значение прекрасного только как намек на человек”(原文第35页)这样的句子译成“自然界的美的生活,只有作为对人的一种暗示才有美的意义”(汉译第10页),如果联系上一句话“красоту в природе составляет то, что напоминает человека”,我们就应该把它改成“自然界的美在于提醒人注意到,自然界之美只有对人有暗示时才会有美的意义”。尽管朱光潜先生指出жизнь兼有“生活”和“生命”两个意义(很遗憾没指出翻译上的原因,而把责任推及车氏本人,说原作者没有区别这两种不同的意义)<sup>16</sup>,而钱中文的“‘认识论美学’思想体系”(《文学评论》1986年第3期)在评述蔡仪主编的《美学原理》时则明确指出了周扬这个译本问题(说жизнь在原作者那儿应该有“生活”、“生命”和“生命力”三个不同层次的意义),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其《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又收录这篇书评(第94-104页),但是事情诚如朱光潜所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1855)在我国解放前是最早的也几乎是唯一的翻译过来的一部完整的西方美学专著,在美学界已成为一部家喻户晓的书。它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很多人都是通过这部书才对美学发生兴趣的,并且形成他们的美学观点,所以它对我国美学思想的发展有难以测量的影响”<sup>17</sup>。这种误读性译语因为始终没有得到修正,继续成为“唯物主义美学”的主要根据所在,这段名言及从中引出的艺术乃“生活的教科书”、“再现生活”、“判断生活”、“改造生活”等常常被中国学界用来作为丰富唯物主义美学的原则。

实际上,“美是生活”在俄国审美观念中也是存在的,但并非是现实主义潮流所致,相反,现实主义审美观是试图通过文学艺术改造生活,用居高临下的视野俯视社会现实,批判性对待现实问题。而19-20世纪之交的现代主义潮流为了矫正生活过于重视物质的庸俗化现象泛滥,试图让文学艺术回到现实生活,提出“艺术即生活”主张,而且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别雷、勃洛克等人身体力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样的理想,把生活当作艺术。虽然苏维埃政权中断了现代主义艺术潮流,却用共产主义理想把现实生活和艺术连接在一起,导致苏维埃主流艺术和非主流艺术都追求“美即生活”。但周扬的翻译与这些是没有关系的。对此等令人疑惑的现象,意裔美国坦普尔大学教授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幽默文学的翻译:对等、补偿、话语》的下面论述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之,“语言不同、表意方法各异,译作无法重现原作的表意过程。翻译总会在各层面上造成原作的损失:形式和意义、句法和语汇、声效和韵律、典故和互文性等都会有所损失。同时,翻译也出现了另外的‘得’,因为翻译根本就是语境的重建,就是构建了另一个文本。通过用另一个不同结构和文学传统的语言改写原作,翻译为之添加性的形式和语义特征。不同语言的句法和词汇不同,有时差别甚大……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总会造成某种语言和文化上的‘得’。这种‘得’逾越了原文,产生了译语文化独有的意义,再现了本土的文学形式、文学传统、价值观念”<sup>18</sup>。周扬对俄罗斯文学批评和理论的误译,也产生了文学翻译的神奇魅力。

<sup>16</sup>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1985年第11次印刷,第563—564、575页。

<sup>17</sup>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1985年第11次印刷,第559页。

<sup>18</sup>辜正坤、史忠义主编:《国际翻译学新探》,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68-169页。

总之，汉译俄罗斯文学批评和理论中的政治学原因，直接影响了现代中国在接受俄国文化的格局，直到 20-21 世纪之交才有人去考虑修正这种格局，即中国社会没有因为翻译俄罗斯文学批评和理论文本，就提升了认识俄国文学的水平，远不及西方译者和研究者关注到俄罗斯文学批评和理论，和俄罗斯文学史一样，都充满着民族主义诉求<sup>19</sup>，甚至导致中国人的审美能力被扭曲。这样译介俄罗斯文学批评和理论，不仅淹没了许多重要的文学批评文本，包括学院派的许多经典、苏联时代许多侨民知识分子的文学批评和理论、后苏联不少具有原创性的文学批评，而且改变了俄罗斯文学批评和理论原初的意义。对这种汉译的俄罗斯文学批评和理论，与俄语的俄罗斯文学批评和理论不尽吻合的情形，其效应虽然吻合瓦尔特·本雅明《译者的任务》(1923)所说的，在任何语言和语言创造中，除了可传达的信息和意义之外，尚有不可能交流的内容，根据其所出现的语境，可以是象征其他事物的东西，也可以是被象征的东西，这些导致译文和原文是不可能一致的，但实质上更有汉译俄罗斯文学批评和理论之潮流被整个译介俄罗斯文本的洪流所携裹的时代原因。

---

<sup>19</sup> See Ewa M. Thompson, *Imperial Knowledge: Russian Literature and Colonialism*(帝国知识：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Westport, C0nnection • London: Greenwood Press, 2000